

三地紀錄片軌跡系列三

四大影展暫停 內地紀錄片野草遍地

今年，對內地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是傷痛之年，主要放映紀錄片的四大影展在各種壓力下暫停了。內地紀錄片製作每年維持在可觀的數字內，但因為觸及很多時下敏感的話題，導演在拍攝的過程中要經歷大大小小的壓力，完成後除了在影展放映外，幾乎沒有正式的渠道與觀眾見面。四大影展的暫停，意味着紀錄片貼近生活、反映真實的功能，再一次面臨考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北京獨立影像展（宋莊）、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南京）、雲之南影像紀錄展（雲南）與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乃中國目前最主要的獨立影展。宋莊、南京與雲之南影展由2003年開始舉辦，前兩者今年已來到第十屆；雲之南則兩年一次，是半官方的活動；重慶影展較為年輕，規模相對來說也沒那麼大，工作人員幾乎都是義工、學生。

上年八月，北京獨立影像展開幕時，電影放了幾分鐘便停電了，無法進行下去，惟之後的放映活動尚算順利；隨之而來的壞消息是，11月舉行的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發出消息，公開放映活動「因故延期」；而最讓人驚訝的是今年三月，雲之南影像紀錄展宣佈暫停舉辦；加上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因為節目總策劃人離開內地也暫停了，四大影展目前都沒有正式的放映活動。

但愈有壓力愈要掙扎，宋莊影展便是最好的示範。今年七月舉辦的第十屆影展，放映活動當然不順利，但主辦方從地上走向地下，以打游擊戰的方式，在酒吧、工作室、私人空間等地方作小型放映。每場放映能容納的觀眾只有十多二十個，影響力可能不大，甚至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圈內人，卻表現了一種態度——觀眾有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堅持與自我期許。而這樣的表態，也超出了一般影展的形式，為以後的影展拓展了更大的空間。

「宋莊影展大給力了。」獨立導演王利波在灣仔咖啡廳接受記者訪問時笑說。

內地紀錄片的情況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其發展太過複雜，每個細節都足以說上半天，甚至連紀錄片導演本身的拍攝過程也是一個亮點、一個故事。

自我審查更可怕

2009年，王利波拍了《掩埋》，帶大家重回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現場，以影像道出地震悲劇背後被人忽略，甚至遺忘的疑問。拍攝這部片子的淵源，來自於2008年發生的汶川大地震。王利波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找了很多資料，偶然之下他找到了當年唐山大地震的一些消息，「汶川地震很難拍，但唐山大地震發生了這些年，社會大眾對事件有共識，比較容易接受，而且事件留給大家的疑問太多，我就跑去拍了。」電影完成後送往各大影展，獲中國紀錄片交流周優秀紀錄片獎、香港第三屆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冠軍等。

去年他又帶來另一部長片《三峽啊》，在宋莊影展放映後，又入圍今年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競賽單元，是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競賽評審團得獎作品。再一次碰觸這些宏大的題材，以三峽工程塵埃落定後遺下的後遺症，如居民的生計、環境影響、利潤分配等，深入分析三峽工程的利弊。王利波坦言，他就是喜歡這種略帶社會性的話題，「我有強烈的政治傾向，這很難避開，有人會迴避政治或在片子內有意無意漏出一些細節去激發大家的興趣，但這不是我想要的，要說就說清楚。」

紀錄片有紀錄社會、反映真實的功能，而在內地，拍紀錄片要有很大的勇氣，因為不知道官方的界線在哪裡，也不知道拍攝的過程會遭遇到甚麼事。「這兩個片子都沒有甚麼秘密，我純粹把資料整理好，你去網上查或許會發現更多信息，我們只是較為接近真相而已。」王利波笑著說，他拍紀錄片是追求名利，也想賺錢，「誰不想有名，誰不想賺更多錢，說不想的人太矯情了。」但所謂的名利，是希望在影展裡得獎，讓更多人認識自己，而賺錢是得獎後有獎金讓自己開拍下一部片。

沒有規範 各自精彩

「我沒有甚麼使命感，我拍片就是為了自己、表達自己，把是非與高興不高興說出來，這是我拍紀錄片的初衷。」因而他接受不了影片被「審

查」，「我可以把片子拿去評級（香港電影有評級制度），但審查與評級不一樣，他們看完後，會要求你修改或不讓你放映，我不能接受。」

王利波說，內地現在每天都發生着挑戰人類底線的事，看多了人都麻木了。「這跟政治沒有關係，是人類道德問題，微博上有太多了。」不愁沒有題材，甚至題材多到讓港台紀錄片工作者「羨慕」。但王利波眼中，同樣覺得香港是個有故事的地方，「香港沒甚麼事發生，但不代表沒有事。」

「香港有很大的社會變化，香港人對未來失去了信心，很多人送子女出去讀書，他們不相信香港的教育制度，但教育是未來社會發展的核心，香港人必須去了解這些問題。」

對他而言，目前面對的困難並非來自於資金或拍攝遭遇困難，而是自我審查和片子完成後沒地方放映。「自我審查是非常可怕的事，比官方審查更可怕。你在這個環境待久了有危機，會有這些不能拍、那句話不能說的情況出現，甚至從選題開始便自我審查，神經很容易被碰觸，這是在特定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反射，太可怕了。」

至於能否放映，「就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但他覺得內地導演各拍各的，已經足夠精彩，「不需要有規範或將之發展成產業，目前這樣很好。」



獨立導演王利波

走東走西

文：余綺平

高校舞會

今年夏天，鄭州、成都和武漢等城市的高中畢業生，仿效美國高校，為自己舉辦畢業舞會。他們穿上晚禮服、開豪華車、攜舞伴走紅地毯。其「奢華」和「炫富」作風，成為國際新聞。

高校舞會風潮，源自美國。在影視文化推波助瀾下，近年全球流行。學生舉辦舞會的花費，可以為業界帶來龐大的商機，例如：晚禮服租借、租車服務、髮型屋生意、花店生意等。

英國的高校舞會文化，十年前才開始。最近《電訊報》雜誌一篇文章剖析了舞會所帶來的商機，認為大有潛力，內地高校舞會風潮剛興起，有意經營此行業者可引以為參考。

文章以倫敦南部的十六歲少女露絲開始，她今年夏天中學畢業，兩年前已開始籌備舞會。她認為舞會比婚禮更重要：「一世人當中，可能結婚多次，但畢業舞會只有一次。」舞會前一個月，露絲去髮型屋嘗試將長直髮改為曲髮，不滿意，變了幾次，結果恢復原形。文章認為，露絲追求完美的心態，正代表畢業舞會在女孩子心裡的重要性。

露絲為舞會花費了約五百英鎊（逾六千港元），包括：理髮、修飾指甲、買晚禮服、買鞋和租車。露絲的父親是公路督導員，母親任職保母，對他們來說，舞會開銷造成經濟壓力，要節衣縮食才能滿足女兒的花費。

文章說，十年前的英國中學畢業生，考完畢業試拉大隊去卡拉OK輕鬆一番。自從美國高校舞會文化吹至英國，如今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全英約85%的中學舉辦高校舞會。

據Holiday Inn去年一項統計顯示，高校舞會的期限很短，只有每年的六月中至七月中這一個月的時間。但在英國，相關行業一年的營業額卻高達八千萬英鎊，平均每個學生花費約二百五十鎊，其中一成人花逾五百鎊、兩成人花逾一千五百鎊。

美國時尚公司Terani Couture在英國開了一百二十間分店，過去幾年，畢業舞會的禮服銷售額令該公司的收益增加四成。一件訂珠片的晚裝售價由二百鎊至一千鎊，該公司曾接到一家長的電話哭訴：「沒錢滿足女兒，怎麼辦？」

富戶人家的父母不惜一切滿足女兒，有一母親自製巨盒，將打扮得天仙般的女兒放進盒內，用豪華房車拖着巨盒送往舞會現場，讓女兒出盡風頭；更有父母棄用豪華車，改租雙層巴士甚至直升機，送兒子去舞會。

露絲所居住的小鎮俱樂部，去年共辦了四十場高校舞會；鎮內一間四星級酒店則辦了十八場。文章說，當地有關舞會的行業，如髮型屋，在六、七月間也忙得喘不過氣，美髮連修甲，每人



平均花費九十英鎊。

內地鄭州等地的高校舞會由學生自辦，而英國則由校方主辦。文章訪問倫敦南部一高校校長說，校方是應學生要求而辦的，起初很形式化，後來愈辦愈精彩，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如「千星之夜」、「占士邦之夜」、「奧斯卡之夜」等。他認為由校方主辦較易控制場面。

文章訪問心理學家說，高校舞會受歡迎的原因，主要是女孩子受影視文化影響，藉出席舞會，將自己裝扮成電影裡的女明星和模特兒，滿足好奇心。他認為，學生高中畢業後要踏入成人社會，畢業舞會意味人生的另一個開始，可以從中學學習和窺探成人世界，家長無須大驚小怪。



鄭闊作品《暖冬》



王利波作品《三峽啊》



獨立導演鄭闊

冷靜審視大環境

「愈有管制，愈激發人的好奇心。」鄭闊一坐下來，就忍不住說起四大影展的事。

紀錄片導演很在意觀眾交流的每一次機會，影展停掉對他們影響很大。「宋莊是北京比較早的電影節，做得很不錯，去年斷電不給放映，今年開幕式可以做，但不可以放映，後來偷着放，幾乎所有片子都放了，卻因為宋莊離城市較遠，很多觀眾知道不能放映了便沒有過來，去的都是導演、藝術家。」其實北京很多咖啡廳、酒吧不時都有放映會，一個月一次或兩次，沒有大規模宣傳，只在微博通知，對獨立電影有興趣的年輕人會自己去關注，總會想辦法去接觸。

「身邊有些朋友，或特別表達想看的觀眾，我會直接拷貝送過去給他們看，另一個方法是拿到外面去參加影展，但內地導演拍完了最理想還是讓內地觀眾看。」鄭闊言語間不無遺憾。

但說起自己的電影，他又眉飛色舞，他的長片《暖冬》在這屆華語紀錄片節得到亞軍，講北京藝術村因為政府收地，藝術家從一開始團結抗爭到最後因為私利反目內訌。鄭闊形容自己是很「隱蔽」地去拍，動作非常快，一個人在現場穿梭，「不容易引起注意」。

拍片是為了拯救自己

「我拍電影是對電影本能的一種喜歡，電影對我來說不是要反映事實、讓大家知道社會現實，

我拍電影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常跟朋友開玩笑說，電影是我的精神排泄物，調節我的內分泌，讓我可以平和地去生活。」年少時，鄭闊也是一個憤怒青年，想不明白很多問題，電影反而能讓他去思考，「我拍《798站》（2010年）時也很憤怒，覺得政府和藝術家有很多誤會，雙方各有自己的目的，很多人去798藝術區參觀，覺得很新鮮，年輕人不知道這個地方背後的事和變化，我特別想表達這個東西，拍完後就放下了，像看完心理醫生一樣。」

《798站》、《暖冬》都是以798藝術區為主題的片子，鄭闊坦言，自己對藝術本身也很有興趣。但他和那群藝術家的身份一樣，看到他們的行為，看到藝術家為了利益無所不用其極，心裡非常糾結。「我拍的時候還好，心情反而很興奮，因為事情一直出乎意料之外，你在現場跟着，很恐怖，大家帶着面具遊行，周遭又有很多警察，非常緊張。」但回去剪輯，情緒就來了，久久無法平復，甚至不知道應該怎麼剪。「人性真的很醜陋，而要曝露人性醜陋面還是用《暖冬》般的抗爭精神去說這件事，是鄭闊最大的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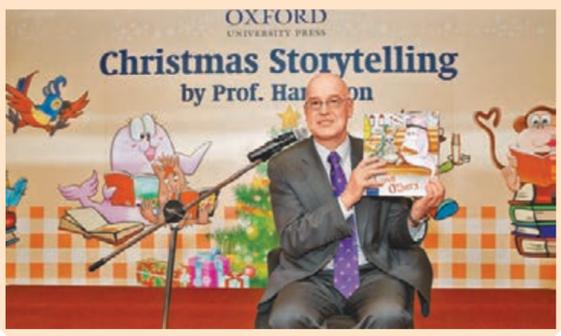
對於紀錄片的未來、對於影展，鄭闊用了《798站》裡一個藝術家的話來概括：「藝術被過分抗爭或過分依賴政治，都會失去獨立性。」他說，「我忠於自己，為自己的立場、為自己的觀點而拍，我不會為了對抗或為了討好人去做這些事。」

保持冷靜、理性，是面對難以掌控的大環境惟一能做的事。

牛津大學校長賀慕敦來港分享聖誕愛的故事

早前牛津大學校長賀慕敦教授（Professor Andrew Hamilton）到訪香港，受到牛津大學出版社之邀，向一群來自基層家庭的兒童，以及牛津英語課程的學員，送上一份別具意義的聖誕禮物，並且讓這些小朋友透過英語對話和故事分享，獲得難能可貴的英語學習經驗。

賀慕敦教授親自主持聖誕英語故事環節，為在場逾60名小朋友朗讀《Love Others》的故事，藉此鼓勵小朋友學習慷慨分享、培養樂於助人的品格。賀慕敦教授的演繹生動有趣，帶領小朋友投入精彩的牛津幼兒英語（Oxford Path）故事世界。除了透過愛與分享為小朋友送上節日祝福，賀慕敦教授更與小朋友交流，講述他對聖誕節的感受和學習英語的心得。最後，一眾小朋友齊齊獻上聖誕歌，答謝賀慕敦教授的探訪及禮物，場面溫馨。



Christmas Storytelling by Prof. Hamilton